

大洋洲研究中的文学与史学关系：兼谈《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的四大特点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in Oceanian Studi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Four Major Features of *Studies of Oceanian Literature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汪诗明 (Wang Shiming)

内容提要：计 8 卷 270 余万字的《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大洋洲学界份量最重亦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这套丛书不仅研究视角独到、谋篇布局合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文史融合，体现了深刻的学理性。该套丛书的面世，不仅对于大洋洲文学界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大洋洲学界有显著的参鉴价值，对于当下正在推进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以及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也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大洋洲文学；文本研究；文史融合

作者简介：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大洋洲历史与文化。

Tit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in Oceanian Studi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Four Major Features of *Studies of Oceanian Literature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Abstract: *Studies of Oceanian Literature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comprising 8 volumes and over 2.7 million words,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nfluential academic works in the field of Oceanian studi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series not only features a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 well-structured layout, but also achieve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n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reflecting profound theoretical insigh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ries holds obvious reference and guiding value for the study of Oceanian literary circle and Oceanian studies more broadly, and it also offers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for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s well as for research on related regional and national issues.

Keywords: multiculturalism; Oceanian literature; textual studies;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uthor: Wang Shim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Oceanian history and culture (Email: wsming555@163.com).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上海交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彭青龙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这共计 8 卷 270 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从课题获准立项到如今的正式出版发行¹，历时八年有余，参与撰写的专家学者达数十位。该套丛书的问世，是大洋洲文学界乃至大洋洲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对推动大洋洲文学研究乃至大洋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具有重要影响。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力通常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而特点本身既生发于研究客体的特质与要求，又源于研究者本体的学养与研究偏好，更体现在与其他同类或相似著作的相较之中。《研究》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本文略作分析，以助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特点与价值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视角独到

谈起大洋洲文学史，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比较多了，从黄源深那一代甚至更早起，我国语言学界准确地说是英语学界就把大洋洲文学当作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我虽然不研习文学，但对文学的兴趣始终未减，也零零星星地读过一些书，看过一些文学论文。给我的一个总体印象（也许是片面的或教条的）是：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把不同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纳入一定的主题或时间框架之内，然后进行文本分析。比较来看，由彭青龙任总主编、我国多位大洋洲研究领域资深专家领衔撰写的这套丛书，在充分汲取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大洋洲文学纳入到多元文化视野之下来审视。这样的选择与安排可谓巧妙与精当。一是把文学概念嵌在文化或文明范畴之内。如果说文学是小概念，那么文化或文明则无疑是大概念，将小概念嵌入大概念之中，便于读者审视文学在文化或文明中的位置，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文化或文明的内涵展开联想。二是把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具有多维意义的时间概念。仅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维度来看，多元文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播已成为一股潮流，单元文化主义随即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多元文化主义一旦取代单元文化主义且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观念时，它所产生的影响将无处不在，对文学的影响尤甚。文学是一个对社会变化较为敏感的领域，现实是文学无法摆脱的“引力场”，是文学得以产生和被理解的基础；文学家们是对社会变

1 彭青龙总主编：《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 年。

化最为敏感的群体之一，社会变化是他们创作的灵感之源。在这一新的理念感召、滋润和引领下的文学创作，定与 70 年代前单元文化主义时期的文学样态迥然有异。这些不同年代、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无论是基于对当下现实的观察与思考，还是对既往历史的回溯与反思，抑或对未来文学创作的规划与前瞻，其本身就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积极回应与吸收，也是多元文化主义成果的本真体现。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知晓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洋洲多元文化主义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意义。正如本套丛书总论所言：

本课题并非要重新撰写一部大洋洲文学史，而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洋洲多元文化思想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呈现。前者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与传播、后殖民历史与文化、大洋洲多元文化格局、大洋洲多元文化关系、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案例分析、多元一体多元文化理论思想、文明互鉴与文化交融共享的新文明观和新文化观为研究内容，从理论上建构和阐释多元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后者以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影响力为标准，选取五十多年（1970 年至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各族群代表性作品为文本，分析和解读蕴含于文本之中的多元文化思想和艺术价值。两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共同揭示大洋洲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和文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研究》1）

二、布局合理

一部佳作除了一个有意义的选题和独特的观察或研究视角外，其谋篇布局也是轻视不得的。谋篇布局或者说框架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或作用：一是对于著作者来说，它能够将著作者的构思及创作意旨很好地呈现出来。如果说，作者的构思与创意是一种“无形的”意念，那么谋篇布局就是一种“有形的”呈现。二是对于读者来说，适宜的框架结构无疑提供了一条更为清晰、便捷的认知路径，便于读者与著作者之间进行一次感官愉悦和心灵契合的对话。三是从著作本身来看，谋篇布局是一种格局或者“形象”的存在。著作本身是一个知识体系的呈现。通过谋篇布局，零散的知识点得以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知识系统；将各部分的篇幅予以一定的比例分配，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这套丛书在谋篇布局方面做了精心策划，令人印象深刻。首先，卷期安排较为合理。《研究》分为理论综合卷（上下卷）、澳大利亚卷（上下卷）、新西兰卷（上下卷）和太平洋岛国与地区卷（上下卷），共计 8 卷。太平洋岛国或地区虽然数量较多，但是文学著作的产出较为有限，能够被中国学界所“感

知的”作品可能不丰，设定为两卷本应在情理之中。比较出人意料的是，《研究》安排了（理论综合卷），而且为上下两卷。我们知道，理论综合卷撰写的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这三大块的文学或文化成果进行比较与综合，总结其异同，而且需要在一般理论层面将相关概念、原理进行阐释与提升，这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与足够的智慧，更需要不断的学术积累和持续的付出。毫不怀疑，这种安排是本套丛书的亮点之一。为何要做如此安排？在我看来，下述考量是其缘由。

（1）丛书主题的需要。“多元文化主义”显然是本套丛书的一个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管理社会多元文化性的公共政策，旨在推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彼此包容，以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因此，“多元文化主义”需要从世界范围内来认识，需要进行历史钩沉和宏观叙事，而非仅仅局限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或太平洋岛国或地区。

（2）多元文化主义需要从历史、政治、经济等视角去解读，而非仅限于文学或文学史视角。历史视角可以最大程度上“复现”多元文化主义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及其动因，如英国在西南太平洋一带的殖民活动建构了当地的权力关系和种族等级制度，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和系统性的历史创伤，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意义上就是纠正殖民历史的黑暗与不公；政治视角则意味着提倡和践行多元文化主义，需要在国家或民族认同方面采取切实举措，需要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原住民的文化身份、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予以确认与尊重，确保他们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经济视角则强调所有人拥有平等参与国家各项经济活动、分享国家资源与财富，以及取得同等报酬的权利。由上可见，多元文化主义需要多角度综合考察。

（3）“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极其丰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起初，“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思维，一种不同于“单元文化主义”的包容性思维；之后它就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在此阶段，它已被一部分人接受、关注并形成了各式各样较为系统的观点；再接下来就被应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称之为“多元文化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最后经过越来越多国家的实践与推广，多元文化主义理论随之生成。“多元文化主义”的上述流变需要学界对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殖民化以及去殖民化路径、后殖民理论等进行回溯、阐释和反思。

（4）大洋洲多元文化需要比较视角。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太平洋岛国与地区文学都是独自成卷，形成了各自的知识体系、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当读者看到这三大块的文学著作时，大家对各自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成就都有一个较为直观和完整的认识，但对大洋洲地区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却较为模糊。理论综合卷将这三大块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及

其实践置放在一起，为广大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该地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变迁及其特点提供了近水楼台之便。

其次，在具体节次的安排上可谓十分用心。以《研究》(澳大利亚卷(上))“第二节 战争与爱情的澳式书写——解读理查德·弗拉纳根的长篇小说《曲径通北》”为例。除正文和结语外，本文作者安排了“作家简介”和“引言”两个部分。“作家简介”和“引言”在其他文学作品解析中皆不乏见，但通常较简，尤其是“作家简介”部分，往往只是肯定了作家的地位，列举几部重要的著作或给予片言只语的内容说明。这套丛书的“作家简介”部分值得细嚼慢品，其内容不仅有学界或社会甚至著作者本人给予作家地位或影响力的评价，还有著述清单、作家生平主要事迹的介绍及其文学创作心路历程的描写，甚至还有一些“趣事”的呈现。在我看来，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完整、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应该包括对作家本人的研究。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既反映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作家本人生活境遇和人生感悟的一种写照。研究作家本人，是对其作品展开研究的入门或第一步。抛开作家本人去品鉴其作品，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可谓食而不知其味，睹而不识其容。而且，作家的创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任何一部作品绝非孤立地存在，作品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作家简介”部分对作家不同时期创作的环境，尤其是政治、社会、人文环境的描写，对于读者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或意图、创作状态等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三、文史融合

文史不分家，文史是一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在文学创作或历史著述中，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为何是这样？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是，传统学科之间有着较为明确的界域，相互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大家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文史不再是一家，文史分家了。¹学科之间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不仅造成了知识的碎片化、知识系统的裂解，也可能出现片面认识甚至舛误的现象。

质言之，文学与史学是两门相互成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学科。史学注重史料真实性和客观性，以探讨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总结历史演进规律为己任；文学则主要直面现实，并以细腻的分析、充盈情感的抒写以及灵动活脱的语言呈现见长。在知识相互融合、公众对知识需求多元以及对阅读体验感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无论是史学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它们在坚守各自学科特色的前提下，也要放下一些“身段”，彼此靠近对方，借

¹ 参见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4（2021）：82-86；汪诗明：“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区域国别学语境下的考察”，《学术界》2（2023）：207-208。

鉴或汲取对方的一些优长，补己之短，成己之美。历史不仅关涉事件的发生，更与人的经历与感受不可割舍。因此，历史作品不仅要讲“硬道理”“大道理”，也要讲“软道理”“小道理”，要有“人情味”。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往往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同理，脱离历史背景的文学研究，容易陷入文本的“空中楼阁”，或难以摆脱庸俗、虚饰、矫情的文字游戏。史学的融入，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语境。同理，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本身往往折射出著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潮流、主流价值观、社会流俗等，是史学研究不可疏离的文献来源。

学术交流是推进学术水平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2018年，我们创办了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该论坛已成为大洋洲研究领域跨学科学术交流的一个机制性平台。¹2021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历史学、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成为这一学科的支撑学科。换句话说，区域国别学就是一门交叉学科或多学科的融合。大家可能对区域国别学有一种僵化的认识，即区域国别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区域国别学不是提倡跨学科研究，而是明确或重申跨学科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属性，否则这门学科就不可能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毫无疑问，区域国别学为大洋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视野和新议题。与传统文学著作不同的是，《研究》有意识地在不同学科之间尤其是文学与史学之间进行嫁接、交叉和融合，比如《研究》（新西兰卷（上））。该卷的第一章题为“当代新西兰社会的多元化进程”。该章下辖四节：第一节是毛利激进主义的生成与新西兰社会的双元化进程；第二节是新移民的到来与新西兰社会的多元化进程；第三节是少数群体的觉醒与新西兰社会的多元化进程。不难看出，无论从时间概念还是从议题逻辑上看，这都是一个历史研究范式。从对具体问题的探讨来看，作者也是遵循历史研究的思路或流程，先从背景或动因的分析入手，再以时间变迁为线索，选择特定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予以条分缕析。单从章节的标题来看，读者很难把它与文学著作书写范式联系起来。以前的文学著作如澳大利亚文学或新西兰文学著作中，在对特定的文学形式或文学作品展开解析前，也有对作品问世的背景或动因做适当的介绍或铺垫，既有史学的形式，也有史学的相关内容，但坦率地说，那是一种较为机械、被动或象征性的安排，内容也相对简单，并没有把史学与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套丛书在把史学糅进文学方面是费了很大气力的，相信这会成为未来大洋洲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

四、学理为上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对学术研究本身的不尊重。学术创新有大小之分，有很多种维度或层次。今天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这样一个呈现接续特

1 参见汪诗明：“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俄罗斯研究》2（2022）：44-45。

征的研究领域，读者既不能苛求它在研究范式或研究主题上有一个革命性变化，因为那是有违学术演进规律的。当然，研究者也不能存在畏难情绪和平庸心理，而是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要把推动学术进步视为己任。无疑，学理提升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也是学术进步的表征。因为学理研究是构建系统性、逻辑性知识大厦的基石。它将零散的经验 and 观察，整合成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和认知体系，使读者能够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世界。此外，人类的知识边界需要不断拓展，而学理研究在其本质上就是不断挑战已有认知极限，并且开辟新的认知疆域。

传统的文学史著作往往偏重于罗列不同时期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然后进行文本分析，其间穿插对一些文学流派及其历史影响的揭示。给读者的感觉是，不同的作品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并无本质性区分。比较来看，《研究》却把学理追寻与提升置于一个较为显著的位置。首先，史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这套丛书有较高的学术站位。前有所述，史学与文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追求。史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或交叉，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细节、内涵，也为文学研究作为历史映像的一种再现工具奠定了必要的以及可以信赖的基础。其次，反思或追问意识的跟进或渗透，使得这套丛书对相关主题的研究已超越文学文本研究本身。一般而言，对文学文本的本位解读与分析并不困难；难的是发现文本所蕴含或传导的信息，并予以整合和提炼，再以这些信息为基础或线索，来揭示文学作品所记载的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或文明的价值取向、民族身份或国家身份的形塑与再造过程。于是，反思或追问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研究手段。反思或追问，不仅是对研究者本人提出的要求，也是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系的一种有效方式。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闭目塞听式的自我发问或了无价值的“炒冷饭”，而是在一种混沌不明的表象中，敏锐地捕捉到核心矛盾、深层困惑或未被发现的隐秘联系，并赋予其探索价值的的能力。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自治领以及现在的英联邦国家。这种历史经历使得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建构不仅成为一个政治议题，也是一个学术命题。不同的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基于各自的学科原理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对此进行了学科式的叩问，并给出了相应的解答。那么文学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如果说政治学考察的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关注社会精英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历史学是从历史变迁的视角，将历史与现实或现实与历史串联起来，寻觅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以及历史演进规律，那么文学则注重对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的观察，意在凸显被政治学和历史学所忽视的微观、个体、底层光谱。殊不知，这些微观、个体、底层才是一个社会或国家建构的基础。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不同的社会感受，但他们并不是毫无共性的存在。这就是不同形式或种类、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文学作品所反映或追求的内容。比如《研究》（澳大利

亚卷（上））中的“第二章：在多种历史文化记忆中追问澳大利亚身份”以及“第三章：在多元文化社会关系中解构与建构澳大利亚”就体现了上述学术追求或学术使命。

结语

上述特点的揭示与阐释只是本人的一孔之见，至于对错如何，在我看来，似乎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期待，就是它们可以让读者们在阅读、评介这套丛书时多一些思路或参照。常言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必须说明的是，所谓的特点的总结和分析与评论人的专业背景、学术阅历及其素养等因素密切相关。循着这种思路，作为学术评介的一个闭环，这套丛书的不足或有待提升的地方应予以指出。首先，学理提炼或理论提升仍有不小的空间。本套丛书中出现的一些概念或理论如殖民化、非殖民化、后殖民化、种族歧视、种族和解、文明、多元文化主义等，并非文学专属，而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非常广泛的学科语境。丛书的著作者们均是文学专业出身，这就使得他（她）们在对相关概念的厘定、相关理论的释义与提升方面面临不少困阻；尽管在对概念的厘定或理论的阐释上也使用了一定的跨学科知识，但囿于专业背景和学术惯习，文学的印记还是较为显明的。这就有力说明：一方面学理提炼或理论提升一直在路上，永无止境；另一方面充分的跨学科知识是学理提炼或理论提升的不二法门。其次，文史结合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这套丛书在文史融合方面是有口碑之誉的，前文已予以充分肯定，但有些文本的解析在此方面并没有达到读者的预期。我们注意到，大洋洲文学史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大都是以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为创作素材或背景的，比如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被偷的一代”、新西兰的《怀唐伊条约》等。对历史事件的溯源、对历史进程的演绎、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历史影响或后果的剖析等等，这些都是历史学的职能所在，也是其擅长之处。尽管国内大洋洲史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水准不及国内的欧美史学，但上述重要事件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关注¹，文学界同仁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己所用。然而，稍感遗憾的是，一些文学作品在分析这些事件时，并没有参鉴相关史学成果。这一现象说明，文史融合以及跨学科研究需要著作者有自觉的意识，需要有多学科专业知识的滋养，需要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经常性的跨学科交流。

Works Cited

彭青龙总主编：《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1 参见汪诗明：“澳大利亚政府的政治道歉与种族和解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1）：21-29；汪诗明：“论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向‘被偷的一代’表示道歉的路径选择”，《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2）：80-87；汪诗明：“《怀唐伊条约》与‘主权让与’问题”，《世界历史》4（2015）：101-113。

[Peng Qinglong, Chief Editor. *Studies of Oceanian Literature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Beijing: Peking UP, 2025.]

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4（2021）：82-86。

[Qian Chengdan. “To Advance the Area Studies by Building It Up as a Discipline.” *University and Disciplines* 4 (2021): 82-86.]

汪诗明：“论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向‘被偷的一代’表示道歉的路径选择”，《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12）：80-87。

[Wang Shiming. “A Choice of Paths of Apologizing by Kevin Rudd’s Government to ‘the Stolen Generation’.” *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2): 80-87.]

——：“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区域国别学语境下的考察”，《学术界》2（2023）：207-208。

[—.“Issues about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cademics* 2 (2023): 207-208.]

——：“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俄罗斯研究》2（2022）：44-45。

[—.“Oceania Studies: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Russian Studies* 2 (2022): 44-45.]

——：“澳大利亚政府的政治道歉与种族和解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1）：21-29。

[—.“A Political Apology from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Racial Reconciliation.”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4 (2011): 21-29.]

——：“《怀唐伊条约》与‘主权让与’问题”，《世界历史》4（2015）：101-113。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nd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World History* 4 (2015): 101-113.]